

十七年期间的鸳鸯蝴蝶派作家

张 均

【提 要】1949年革命胜利后不但鸳鸯蝴蝶派作品以各种形式长时间“残存”，而且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多数仍以笔耕为业。虽然成绩未必可以高评，但作为一个曾经风云际会的文人群体，鸳蝴派在建国后十七年间仍然存在。其“流风余韵”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才彻底消失。自新文学运动肇兴以来，鸳鸯蝴蝶派文学始终受到五四知识分子的贬抑与排斥。1949年后机关报政权通过新组织制度、出版制度发动了对鸳鸯蝴蝶派的打击，平、津两地鸳蝴作家受损严重。1952~1955年，鸳蝴作家沉寂无言，一片凋零。1956年毛泽东发动整风，鼓励知识分子“鸣”“放”。鸳蝴文人处境得到披露并获明显改善。不过，这种复苏毕竟来得太迟，新的鸳蝴创作已只能充作文坛点缀。

【关键词】鸳鸯蝴蝶派 延安文人 政策

【中图分类号】I206.7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A **【文章编号】**1000-114X(2010)01-0153-07

对于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鸳鸯蝴蝶派作家，学界极少注意。推其原因，大约受刘扬体影响。刘先生以为，“随着旧制度的崩溃，新中国的建立，旧的生活土壤的根本改变，新的文化和文艺政策自上而下的贯彻，不仅‘鸳鸯蝴蝶派’，所有以旧式的传统章法、语言写作，缺少新思想新气象的通俗文学，都一起结束了它们在祖国大陆上的存在。”^①这种判断不太准确。其实，建国后不但鸳鸯蝴蝶派作品以各种形式长时间“残存”，而且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多数仍以笔耕为业。虽然成绩未必可以高评，但作为一个曾经风云际会的文人群体，鸳蝴派在建国后十七年间仍然存在。其“流风余韵”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才彻底消失。

一、建国初中国共产党对鸳蝴作家的政策

在建国前不同类别文学文本中，鸳蝴作品受众最广，跨越不同地域与文化层次。从民国初年到四十年代，它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文人群体，前后迭经三代：民初至二十年代的沪苏扬才子群、抗战时期的“北派”作家群、战后海派小报文人群体。期间才人辈出，有“五虎将”、“十八罗汉”之誉，知名作家包括：徐枕亚、李涵秋、包天笑、周瘦鹃、张恨水、孙玉声、张春帆、吴双热、李定夷、王西神、王钝根、朱瘦菊、毕倚虹、严独鹤、范烟桥、郑逸梅、程小青、徐卓

呆、向恺然、李寿民、王小逸、胡梯维、秦瘦鹃等。此外，鸳鸯蝴蝶派还拥有一批声名煊赫的刊物。国共内战时期，鸳蝴文学面临大的变动。沪苏扬才子群“零落星散”，“通俗文学活动中心，从上海、重庆转向平、津。”^②平津新才子群代之而起，史称“北派”。其重要小说家，包括刘云若、冯玉奇、王度庐、李熏风、耿小的（言情）、还珠楼主、宫白羽、郑证因、朱贞木（武侠）等。同时，上海又崛起了小报文人群体，如捉刀人（王小逸）、冯蘅、周天籁、田舍郎、苏广成、桑旦华、金小春、蓝白黑等。至1949年，鸳鸯蝴蝶派虽然迭经战乱，但南北合力，兼之集大成者张恨水坐镇北平，仍可谓人才济济。

建国伊始，新政权通过新组织制度、出版制度发动了对鸳鸯蝴蝶派的打击。这种做法，是“五四”破旧立新思维的延续。本来，自新文学运动肇兴以来，鸳鸯蝴蝶派文学始终受到五四知识分子的贬抑与排斥。五四新作家屡以现代性的进步话语挤压鸳鸯蝴蝶派，而鸳鸯蝴蝶派则努力抵制这种侵犯企图，双方呈割据分治状态。1949年后鸳蝴文学整体性地破碎为革命大叙事的边角点缀，鸳鸯蝴蝶派作家则受到全面压制，失去出版阵地与聚集写作的舆论环境。

打击鸳蝴文艺，并非出自中共中央安排。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袖对鸳蝴作家的处理意见，未形成直接文件或指示。但他们对鸳蝴文学的态度，不难梳理。石楠披露的张恨水材料表明，延安曾翻印《水浒新传》，毛泽东读过《春明外史》，周恩来在《新民报》座谈会（1941年）上亦亲口称赞过《八十一梦》。足见毛、周等领袖对张恨水其人其文有一定了解。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，毛还约张长谈，并亲赠延安土产粗呢一块、红枣一包、小米一袋^③。这表明，党的领袖对张恨水怀有好感。但若以此作为中共青睐鸳蝴作家的证据，又不免误解。毛约见张，非因张作为鸳蝴小说家的文学成就，而是考虑到他身为《新民报》主笔的言政影响。当时，在周恩来安排下，毛还约见王芸生、赵超构等言论界实力人物。这些亲近举动，意在争取政治舆论。但是，毛、周对作为鸳蝴小说家的张恨水并不看重。最有力证据是建国后张的处境。在鸳蝴界，张之份量与茅盾在新文学界相当，可谓一代“文宗”，但二人境遇悬殊。茅盾被授以文化部部长高位，张则无人过问。建国后，中共中央未将鸳蝴作家列入招抚对象（如对郭茅巴老曹），更未将他们列为剿除对象（如对自由主义作家），而是疏漏、遗忘了他们。

作如此判断有理论根据。党录用人才，落后/进步固是公开标准，但实力是更重要考量要素。这种实力与读者、市场有关，但根本上取决于其话语类型。鸳蝴文学的市场占有，优于新文学，但其话语类型属于一种“安全的叙述”。它情节曲折，想象奇异，但思想总以重复主流观念为前提。对当权政府而言，鸳蝴文学毋宁是“安全”的。恰如A·Hauser所言，“大众艺术是‘盲目的，沉溺于奇思幻想之中’，任何正常的人都要为此而深觉沮丧，大众文化所教育者无他，就是让大众谦卑顺从而已。”^④

鸳蝴文学缺乏异议陈述，唤起大众对现存秩序的抵触。这一特点使之不能与新文学相提并论。新文学具有高雅艺术特征，“纯真的艺术（高雅文化）并不鼓励人们安于现状……（它）不单抗拒异化，它并且抨击主流的政治与经济秩序。”^⑤新文学以现代性历史话语为编码原则，以黑暗/光明、落后/进步、罪恶/幸福等二项对立结构表述生活。它往往将现实政治（如国民党统治）表述为黑暗、罪恶力量，并通过对新的理想政治的想象，来激发、引导读者抗击黑暗、创造未来的冲动。这种讲述，对现行政治是破坏性的，具有强烈伤害能力。尤其是，新文学已培育出稳定读者群体，在精英群体中影响甚大。而鸳蝴文学，不具备这类破坏质素，不会激起读者对现实政治的叛逆。

这是鸳蝴作家当初选择的结果。因为，新文学激进表述，对于初涉人生的新式学生，可能有潜移默化之功，但对于久经世故的成年读者，则高度冒险，可能反遭其道德信条与实用哲学的讥薄。为市场考虑，鸳蝴作家不会作这种“超前”冒险。他们更愿意在大众道德层次上，提供平面性阅读消费。大众道德如何，他们便如何讲述。鸳蝴文学研究专家刘扬体列出的几类鸳蝴主题——譬如“一定程度的民主意识”、“爱国主义精神”、“同情弱小、扶危济困、除暴安良、急公好义、成人之美、愿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以及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，明哲保身、清白做人、孝亲友弟、尊老爱幼等等传统观念”^⑥——显然都未超出大众常识。不挑战，不犯忌，易获得广泛认同。它浅显而不越矩，不在革命主流之外另建独立“道统”，故也无力以否定、批判成为令人不安的异端和叛逆。鸳蝴文学这种不重新设想正义与伦理的写作模式，导致它缺乏对现行统治集团质疑和破坏的力量。本来，按照“文化霸权”建立的常规，刚刚取得政权的政党会和“对立的社会集团、阶级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进行谈判……（并）将对立一方的利益接纳到自身。”^⑦鸳蝴叙事的高度“安全”则难以引起党的敏感。民国以来，鸳蝴作家一直遭到当权者忽略。国民党屡次查禁新文学刊物，对鸳蝴文学却极少如此。其原因，自不在于蒋介石对鸳蝴作家“法外推恩”，不过不以为意而已。鸳蝴文人群体也历来无意与统治集团发生纠葛，只是钟情浅吟低唱，在一个市场化出版环境中觅得娱人自娱的独立空间。

中共中央忽略无破坏性质素的鸳蝴文学，延安作家却难以忽略。作为党的高级文艺官员，丁玲在多种场合毫不隐讳地批评鸳蝴作家。1949年10月，在一次青年文艺讲座上，丁玲严厉指责鸳蝴作品“使一个人的感情低级，无聊，空洞，庸俗”，并宣布，“这一类小说的作者是没有出路的。现在北京这样的‘文人’不少，他们如果不好好从思想上改造，他们如果还以为可以麻醉些读者，可以混饭吃，那简直是幻想。因为小市民也在进步，在新的国家里，凡是起腐蚀作用的东西，是不能生存下去的。”^⑧丁玲还利用她主编的《文艺报》，对鸳蝴文学及其作家发起“围剿”性批评，将鸳蝴文学彻底放逐为“进步”的反面。这更激起了文坛对于鸳蝴文学的普遍鄙视。

二、制度性遗忘

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，张恨水被推荐为正式代表。但在代表资格审查时，他与沈从文两人未获通过，原因在于他们曾被郭沫若批评为黄色作家和粉红色作家。后来为团结起见，虑及他们的影响，另立一新名称：特邀代表。而后新成立的“全国文联”等部门，对张恨水未表示出什么兴趣。无人请他编辑刊物，甚至无人来登记他的工作单位。张恨水骤然成为失业人士。张被遗忘，主要不是因于政治，而是因为他在解放时已退出《新民报》。

张恨水作为鸳蝴文人群体的旗帜，好歹还列名一次文代会。但阵容庞大的鸳蝴作家，仅他一人获此“殊遇”，其他人皆不被承认为“作家”，仅被目为“旧文人”或“封建文人”，像《蜀山剑侠传》作者还珠楼主（李寿民）、《江湖奇侠传》作者平江不肖生（向恺然）这样名动一时的武侠大家，在全国文联名册里竟然不能找到。少数“旧文人”若运气好，倒可列名市县文联。但与这类人交往往往被非议。葛翠琳回忆，老舍任北京文联主席时，与鸳蝴作家金受申、金寄水多有交谊，“于是有一种舆论，说老舍先生旧意识很浓，欣赏趣味，结交来往的朋友，大都是旧艺人、旧画家、封建文人等。还说他把浓厚的旧意识带进市文联机关来，主席办公室变成了旧文人的据点儿了”^⑨。

多数鸳鸯作家迅速堕入经济困顿。1950年,“天津张恨水”刘云若、前《礼拜六》主编王钝根相继怅然弃世。另外一些鸳鸯作家则为谋生不得离开文学。平江不肖生到湖南文史馆任职,王度庐到旅大师范专科学校充任教员,王小逸(捉刀人)进入上海市南中学。更多鸳鸯作家,由于对新社会缺乏了解,不明单位制度意味,兼之缺乏门路,未能进入有稳定薪金的单位。他们仍“卖文为生”,结果艰难异常,风雨飘零。鸳鸯文人迅速解体。1950年,在北京租书摊上,“武侠和言情小说,新作品很少……言情的简直就没有什么新东西,张恨水、冯玉奇不写了,刘云若死了耿小的参加了工作,至于所谓新作家,更没有出现什么。”^⑩

平、津两地鸳鸯作家受损严重。而华东主持文学界工作的夏衍,与鸳鸯作家如唐大郎、龚之方等颇有私交,态度就略有宽容。上海建国后,甚至由党出面,新创办《大报》、《亦报》两种小报,网罗一批小报文人,如名气仅次于捉刀人的陈亮(田舍郎)。其他鸳鸯作家也多能谋得一份职业。秦瘦鸥在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编辑。严独鹤作为《新闻报》副总编辑,较受优待,出任新闻图书馆主任。久已搁笔的周瘦鹃,还于1951年被邀请出席苏南区第一届文代会。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,专门接见他,并致信鼓励。这类待遇非平津作家所能有。但局部宽解和私人友好,不能改变排斥本质。即使在上海,夏衍也不时受到批评。《大报》《亦报》仅坚持两年,即以停刊了事。鸳鸯作品被拒绝出版,大量旧作被作为淫秽、黄色书刊查禁。徐訏、无名氏、仇章、张竞生、王小逸、蓝白黑、笑生、待燕楼主、冷如雁、田舍郎、桑旦华、冯玉奇、刘云若、周天籁、耿小的、朱贞木、郑证因、李寿民、王度庐、宫白羽、徐春羽等21人,还直接登上了文化部查禁黄色作品的“黑名单”^⑪。

1952~1955年,鸳鸯作家沉寂无言,一片凋零。这难免出人意料。故在政策实行过程中,两种调节性力量也逐渐出现。一是具有一定话事权的“旧知识分子”群体,譬如茅盾、叶圣陶等。他们是延安文人的师辈,建国前也曾批评鸳鸯文学。他们习惯鸳鸯文学边缘化,倒未见得希望它们真的绝灭于文坛。所以,在五十年代,胡愈之、叶圣陶以出版总署名义,数度下文,禁止对鸳鸯作品乱封乱禁,规定查禁书刊,须报上级机关批准。如1951年11月26日《出版总署关于查禁书刊的规定》称,“查禁书刊过去没有统一的制度。最近书刊审读工作各地都在逐渐加强,对于政治上反动及有严重错误的书刊,各地往往自行禁售,既没有报请总署批准,也没有通知其他地区采取共同行动。由于各地区在禁售书刊中的标准与行动不能完全一致,致使甲地区已禁售的书刊,乙地区仍在流行。兹特规定:今后禁售书刊必须经本署批准。但对于政治上反动及有严重错误的书刊,在未经本署批准禁售前各地可先行封存。”^⑫

在中共中央,周恩来作为一种特殊调节力量,对知识分子一直很为关注。他对张恨水两次见危出手(1953年安排为文化部顾问、1958年安排为文史馆馆员,并发放生活补贴),表明着高层态度。

三 “卖文为生”的尴尬

在党的出版社内,对鸳鸯作家的作品出版,非常挑剔,定额高,稿费低,明显受到歧视。这种境况,加之作协“关门主义”、评论界“围剿”,使鸳鸯作家群体性自卑加剧发展。在现实压力与自卑意识的双重作用下,他们也努力搬弄马列主义新名词,作自我检讨。据《文艺报》报道,他们“对于自己过去的写作一致地加以批判”,“沉痛地说:‘我们过去写的都是低级趣味的东西,里面是鬼话连篇’。‘我们的作品给青年人很多坏影响,给人民散布了毒素’。”^⑬显然,鸳

蝴蝶作家希望以“臣服”姿态获得接纳。这种努力发生一定效果，他们获得重新写作的许可。但是，新刊物并不考虑向他们约稿。张恨水身在北京，近在咫尺的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文艺报》，从不与他联系。赵树理主编的通俗刊物《说说唱唱》倒与他及少数声名较大的“旧文人”有所联系。但“旧文人”写作显然不能“满足”《说说唱唱》的需要。1953年，北京文联在工作汇报中明确表明这种看法。文联认为，他们的写作完全“落后”于时代，“旧小说家……的政治思想水平很低，又不熟悉新社会，如张恨水、陈慎言等，写东西很多很快，但都不能用，如张恨水仍以旧社会恋爱的条件和方式（容貌、偏爱、看电影、逛北海）来写目前的恋爱问题。”张友鸾利用原《新民报》工作关系，刊发了一部力图靠近革命文学的转型新作《神龛记》。

批评家对鸳鸯写作大加鞭伐。余雷说，“那群黄色作品的写作者，事实上做了旧统治阶级的帮凶”^⑩。1952年，《文艺报》刊发专文，批评张友鸾《神龛记》为“不法商人”“辩护”，张友鸾仓惶检讨。而张恨水旧作《啼笑因缘》，也受到“修正”与批评。这些批评，使鸳鸯文人群体无以面对。既然旧作、新编都“不合时宜”，他们的写作信心，就不能不迅速削弱。在这种形势下，他们不敢写，不能写，写了也往往卖不出去。“卖文”困难，衣食不继的状况就很快发生了。

在20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，彻彻底底“卖文为生”相当艰难。鲁迅曾言，“我想，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，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，只有伶俐最值钱。倘真要直直落落，借文字谋生，则据我的经验，卖来卖去，来回至少一个月，多则一年余，待款子寄到时，作者不但已经饿死，倘在夏天，连筋肉也都烂尽了，那里还有吃饭的肚子。”^⑪鲁迅用语或有夸张，但实情其实相去不远。所以，鸳鸯作家创作量虽大，但真正能一博万金、一夜暴富者，也仅张恨水、张秋虫、王小逸数人而已。大部分作家却生计艰难。三十年代，普通稿费每千字约1至3元，每天必写2千字且必卖出，方可糊口。这很困难。还珠楼主是高产作家，他在天津《天风报》连载《蜀山剑侠传》，边连载，边出书，至1949年，已出版55集350万字。但稿费所得，仍难以养家。魏绍昌回忆，“李寿民子女多，家庭负担重，尤其其他后来目力不济，只得请两个秘书帮助笔录，支出更大了。他每天非写两万不可。”^⑫刘云若薄利多销，经济也不乐观。白羽曾戏说，“云若近日渴望发财，发财则可闭门著书，勒成名作。昔戴南山自谓胸中有一部书，犹未写出；方灵皋已深信其胸中果有一部书也。我于云若，亦复云云。何日不愁柴米，得泰然拈笔，写其所欲写耶？且同俾望，有此一日。”^⑬由此可见一斑。“北方武侠小说巨擘”^⑭王度庐，撰有《卧虎藏龙》（1941-1944）、《铁骑银瓶》（1942）等名作，总数达33部，但仍不敷家用，不得不兼作中学代课教师、赛马场售票员，甚至摆地摊卖春联。其艰难自不必言。被人看不起亦不言而喻。体制外纯粹“卖文为生”，无异于吃“青春饭”，挣血汗钱。而且，国共内战时期，通货膨胀，鸳鸯作家即便有所积蓄，也多荡然无存，生计艰难。周瘦鹃有《苏州近事杂咏》载其事云，“炭薪已尽难为继，茶灶尘封釜甑凉。饥火中烧正不耐，更无热火润枯肠”^⑮。张恨水也回忆说，“自由职业者，就非常的痛苦，尤其是按字卖文的人，手足无所措。月初，约好了每千字的稿费，也许可以买两三斤米，到了下月初接到稿费的时候，半斤米都买不着了。”所以，建国后，鸳鸯作家一旦不能“卖文为生”，很快就出现生存之忧。

无以为生之下，鸳鸯作家只好“硬写”。言情和武侠已验明“黄色”之身，不便再写。而现代题材，又把握不准（张友鸾的《神龛记》是为一例）。唯有传统戏曲和民间传说故事不犯忌，在书写逻辑上与鸳鸯小说亦较接近，遂成为首选。于是，在1952年之后，鸳鸯作家从都市通俗

创作，集体性转入乡场通俗创作。后者受到了党的鼓励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张恨水海内知名，发表渠道、稿酬标准皆还如意，但其他数以百计的作者就不能如此。他们有着不良名声，在通俗刊物与出版体制中无尺寸权力，写作与发表仍然艰难。因此，不少人不得不走向歧途。1955年，一则是由通俗文艺出版社编辑陈允豪捅出来的文坛“丑闻”，让人看到鸳蝴文人群体谋生的辛酸。陈允豪揭露，“北京通俗文艺的组织者”苗培时，把鸳蝴作家当成了雇佣工人，狠加剥削。据说，“去年冬天，苗培时对通俗文艺出版社说，他要写一本《李闯王演义》的长篇小说，……当时口头约定今年八月交稿。但今年四月里，怪事发生了：出版社偶然发现有一位姓刘的‘旧知识分子’正在写这个《李闯王演义》。一问之下，真相大白，原来是苗培时交给他的‘任务’。苗培时对这位姓刘的说，‘《李闯王演义》是部革命历史故事，旧具名不方便，出书用我的名义。这是任务，你写作期间，我每个月给你些生活费’。并叮嘱姓刘的说：‘此事不必同外人谈’……更加荒唐的事发生在今年春天：这位利欲熏心的‘掮客’，进一步用个人名义‘组织’了一批旧社会黄色小报的作者，专门化名替某地报刊写小说。……苗培时在‘研究选题’的会上就当面对这群人说：‘审稿费按稿酬数目而定。稿酬每千字八元的，审稿费每千字一元；每千字十二元的，审稿费一元五角；每千字十六元的，审稿费二元’。其用心之精细，剥削之凶狠，是使人吃惊的！”^②不过，这种潦倒挣扎状况，1957年后得到较大改观。

四、迟到的复苏

1956年毛泽东发动整风，鼓励知识分子“鸣”“放”。鸳蝴文人处境得到披露并获明显改善。此年，中国作协组织作家参观团游历西北，张恨水、还珠楼主都获参加，到玉门油矿、铜川煤矿等处参观。同时，一批鸳蝴作家还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，如周瘦鹃、严独鹤。1957年，作协又专门召开“通俗文艺作家座谈会”。这种座谈会，1949年也曾召开，但当时名为“旧的章回、连载小说作者座谈会”。会议名称从“作者”升格为“作家”，可见作协态度改变。会上，张恨水、张友鸾等获得机会“为他们和他们作品的现实处境，为他们的文学史地位进行辩护和争取。”^③这种宽松环境为鸳蝴作家复苏提供了很大可能。

1956~1957年，鸳蝴作家迎来“小阳春”。陈慎言1956年为《中国新闻》写散文数十篇，介绍福建风俗，1957年计划写一部民间故事《菜头大桥》与艺人故事《艺海情潮》。还珠楼主此前编写过剧本《赵氏孤儿》、《文君当炉》，此时计划“庞大”，拟写《一个劳模》、《勘探姑娘》、《游侠列传》和《刺客列传》等。《新民晚报》副刊1957年刊出张友鸾（署名“草厂”）写的中篇连载小说：《杏花庄》、《魔合罗》、《赛霸王》、《鲁斋郎》、《救风尘》等。《文汇报》笔会副刊也发表大量小品诗词，成为鸳蝴作家聚集地。这些旧式作品受到毛泽东称赞。

1957年，鸳蝴作家早是闲散人员，“反右”没有太大冲击（张友鸾被增为“右派”，很快摘帽）。鸳蝴作家意外地在党的作家的内讧中，迎来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与写作环境。周瘦鹃、严独鹤先后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。到五六十年代之交，随着对延安文人的疏远，喜爱“旧文学”的毛泽东和这批擅于诗词唱和的闲散“旧文人”建立了联系。1959年，毛泽东接见周瘦鹃，1962年又接见郑逸梅。由于周瘦鹃本人兼以养菊知名，陈毅、叶剑英、廖承志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刘伯承等高层人物，都登门访见。这种眷顾，令鸳蝴作家获得复苏机会。周瘦鹃接连出版《花花草草》、《花前琐记》、《园艺杂谈》、《盆栽趣味》、《拈花集》等多种小品。1962年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，专门摄制张恨水记录片《老人的青春》。这不能不说是很高荣耀。借此“东风”，

严独鹤在《新民晚报》、张友鸾在香港《大公报》都开辟专栏。陈亮（田舍郎）甚至创作了犯忌的小说《黑弄堂》，于同年在《新民晚报》连载。

不过，这种复苏毕竟来得太迟。新的鸳鸯蝴蝶创作已只能充作文坛点缀。而且英雄迟暮，鸳鸯文人团体此时后继无人，北派才子和小报文人步入全面凋零期。平江不肖生、陈慎言于1957年，还珠楼主于1961年，张恨水于1967年，严独鹤于1968年，相继逝去。获眷最隆的周瘦鹃，因为与田汉、夏衍过于密切的交往，亦于1968年投井自杀。王小逸进上海市南中学后，不再为人所知。

①②⑥刘扬体：《流变中的流派——“鸳鸯蝴蝶派”新论》，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，1997年，第39、39、52页。

③石楠：《张恨水传》，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397~399页。

④⑤（英）斯威伍德：《大众文化的神话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03年，第21、20页。

⑦（英）托尼·本尼特：《英国文化研究导言》，《文化研究读本·前言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0年。

⑧丁玲：《在前进的道路上》，《丁玲文集·卷6》，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27页。

⑨葛翠琳：《魂系何处——老舍的悲剧》，《百年文坛忆录》，北京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92页。

⑩康濯：《谈说北京租书摊》，北京：《文艺报》，1950年，2卷4期，第27页。

⑪《文化部关于续发处理反动、淫秽、荒诞图书参考目录的通知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·卷8》，北京：中国书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2~3页。

⑫《出版总署关于查禁书刊的规定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·卷3》，北京：中国书籍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20页。

⑬杨犁：《争取小市民层的读者》，北京：《文艺报》，1949年1卷1期，第7页。

⑭余雷：《黄色文化的末路》，北京：《文艺报》，1949年1卷7期，第29页。

⑮鲁迅：《华盖集·并非闲话（三）》，《鲁迅全集·卷3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150页。

⑯魏绍昌：《我看鸳鸯蝴蝶派》，香港：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160页。

⑰范伯群：《言情圣手、武侠大家——王度庐》，南京：南京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41页。

⑱张恨水：《我的创作和生活》，《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·上》，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62年。

⑲陈允豪：《文艺“掇客”苗培时》，北京：《文艺报》，1955年23期，第12页。

⑳㉑洪子诚：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26、127页。

作者简介：张均，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、博士。广州 510275

[责任编辑 韩冷]